

中国经济学及教材体系建设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研讨会”笔谈

[编者按] 为了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2020年5月8日,受教育部教材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线举办“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5期),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发言嘉宾包括裴长洪、宋敏、范从来、黄少安、邱海平、安同良、周文、任保平、李建军、臧旭恒(按发言顺序排列),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主持。与会专家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达成了初步共识,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历史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中国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意义重大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在此,将与专家的核心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呈现,以飨读者。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及教科书编写

裴长洪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在内容上仍然是大头,且存在盲目“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现象,这种状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很不相称。这首先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经济学,目前大学里起主导的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综合体,其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停留在20世纪。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今天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已经把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大大拓展,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产生了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形成了数字平台和网络交易,催生了新的市场化的公共经济。而对这些新现象、新经济的研究,都还没有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其次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存在明显的立场缺陷。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体现的立场导向是维护资本的统治,是为资本服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2488)。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务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立场和基本的价值观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显然是矛盾的,毫无保留和毫无分析地使用其教材的内容,不利于我国当代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再次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性。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是在总结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和学术,对20世纪世界上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现象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特殊的发展中大国,其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使用这种教材,将会像列宁所批判的那样,“九分无用、一分有害”,不利于大学生学习和认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发展,不利于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于经济学知识积累的需要。这种状况亟须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管理,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破旧立新的变革之中,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长期处于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之中,许多创新性认识还不成熟、不系统,还需要不断取得共识,因此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滞后于实际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期先引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以满足教学需要并进行检验和识别也是必要的权宜之计。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均已比较成熟,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内在规律的实践依据已经基本具备。更重要的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形成了若干阶段性发展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揭示已经有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导,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系统化、成熟化和取得共识的根本保障。因此启动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正当其时。编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要求是:

1. 要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各领域中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揭示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性认识,不仅应能解释以往的发展现象和经验,同时也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实践探索的理论指导。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及其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启发受教育者在中国自身的实践舞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避免言必称希腊和眼高手低。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不苛求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具有同等的解释力,当然更不应是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义生搬硬套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实践。能够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其理论意义的一般性必定寓于特殊性之中。

2. 要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支撑点。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支撑点,应当是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或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提出的重大经济理论观点或重大经济理念所组成。世人皆知,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领导人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经济理念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有的是对以往经济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有的是应对未来经济发展挑战的实践指南。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对实践的认识抽象性。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这是最珍贵的理论研究的“中间品”。这要比经济学研究者个人盲目地在浩如烟海的实践案例中抽象和提取最本质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最高的效率和最准确的命中率。因此对这些重大的经济理论观点、经济理念的研究和学理阐释,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术的重要理论内涵。

3. 学术范式要三统一。中国经济学的学术范式和叙述逻辑应当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中国实践逻辑的三者统一。理论逻辑是指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当然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它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实践的逻辑分析、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念和学理认识;吸收它顺应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潮流的经济理念和治理要求;吸收它一些场景适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组成内容。历史逻辑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对事物的认知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实践逻辑是指党和国家权威性文献对中国发

展事实的基本概括和解读。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叙述方式应当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不仅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变化和新需要，还要使受教育者知道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4. 要有比较与鉴别。建立比较完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认识，还需要开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和鉴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转述、翻译或干脆直接引进大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缺乏对它们的评价和鉴别。许多对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解释力，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种特殊的发展中大国缺乏解释力，对一些立场观点都明显错误的理论和教义现行教科书更缺乏鉴别和批驳。例如，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内核——新自由主义和“经济人”假设等经济学教义，长期以来缺乏有说服力的批判。如果我们长期难以构建识别和评价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能力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那么我们就难以实现理论自信。

编写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应打破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而是主要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高校教学的实际需要。建议列入第一批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的有以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公共经济学、中国金融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评介（宏观微观合并）、西方经济思想史评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0—1949）。

其理由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需要有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描述它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以及揭示其制度和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期盼。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推荐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并且提出要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 1992年，江泽民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可见，如何把中国经济建设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上升为理论体系，成为具有学理意义的经济科学，是历代党的领导人的期盼和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的论述更多、更具体。他在2014年邀请经济学界专家座谈经济形势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② 在2015年11月党的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③ 2015年12月，习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概念，他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制度和体制的变革与完善，因此还不足以囊括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②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9日。

③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主义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还需要有若干最主要领域经济理论的具体阐述加以补充。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笼罩和指引下，还应当有一部专门描述和刻画新中国70多年经济发展的教科书，使之成为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则是一部专门叙述和揭示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程规律的书，从微观和宏观以及全球治理等主要方面展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理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教材建设是为了顺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来愈需要发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们以公共卫生和医疗防控为主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水平亟须提高，其社会化再生产及其特定市场亟须完善，也更需要尽快将其理论认识引入高校课堂。中国金融体制和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都与西方的制度、体制、道路有极大差别，需要有相应的教科书向我们的大学生普及这些知识，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于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现代经济学的评介，也应当成为教科书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不缺乏治国理政的文化遗产，但缺乏比较系统的经济学逻辑思考和学理辨析。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不得不先后从苏联和西方引进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7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经济理念和经济学观点，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完全有条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如何为我所用进行评价和介绍。

教材编写的组织方式，可以以一位知名专家牵头，并由其召集三四位助手，负责编写其中一本教材。要在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避免几十位知名专家凑集一起写一本书，要么谁也不负责任，要么互不服气，难以达成共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且在高等教育的社会科学领域，同一本教材出现几个版本和几个编写组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应当让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形成一个由主管部门合理调控的“教材市场”。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生命力不应直接靠行政命令来维持，而主要应当靠教师和学生的选择。当然，我们也要营造有利于让教师和学生选择中国经济学教科书的外部条件来支持它的成长。其中，教师的进修和培训是最重要的，在这方面应当创造一些条件；同时应当废止目前有些高校中存在的不合理规定，例如，不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者不去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进修一年就不能评职称。同样道理，对于现在高校中已经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必急于替换和替代，也应当允许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取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 经济学教材建设

任保平

教材是经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教学内容的载体，教材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

[作者简介] 任保平，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陕西 西安 710127）。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